



博古通今 中西融贯

——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曹顺庆访谈

□韩晓清

韩晓清:看来阅读经典对一个人学养的培育还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教育家,您肯定有一套独特的教育培养模式,您能否谈一谈您的教育模式或者说您的文学教育思想?

曹顺庆:教育家不敢当,文学教育思想也谈不上,只能谈点滴体会。总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元典阅读

2006年,社会科学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十三经”》的关于我的专访。在访谈中,我回答了给研究生开设“中国文学元典:《十三经》”这门课程的原因以及重要性。我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二,对自己传统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状态,从而导致自身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第三,在整个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反而出现了一种“文化空心化”的趋势。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尊重,现代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陷入了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一并丧失的境地。

自1995年以来,我的每一位博士生,不但在入学考试时要参加“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这门课的考试,而且在他们入学后还要系统地学习《十三经》。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这门课考查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范围大、涵盖面广。试题中既有填空、翻译、句读等纯识记性的客观题,又有简答、分析、论述等主观题,既可以了解学生的文学功底,又考察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再加上对博士生的面试环节,让不少考生“痛苦不堪”。如果没有全面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他们是不可能过关的。某高校一位古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看过四川大学文学典籍的考博试题之后,慨叹道:“这样的试题,讲授古代文学的教师都不见得能答及格,更何况是学外国文学的学生呢?”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样做,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入门后,每一位博士生,都要在我的带领下系统学习《十三经》,采用的教材是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元校注的繁体字影印版本。从《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记》《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孝经》《尔雅》《论语》《孟子》一部部学下来,原汁原味地领略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经过严格的元典的训练后,我还要求他们一字不漏地全文背诵古代经典文论,包括至少10篇《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全文、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贽的《童心说》等。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来说,这都是一种“魔鬼式的训练”,每一位同学都要在课堂上当堂背诵。我曾经解释过自己的用心所在:我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

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

我认为,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正如学习西方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阅读文化经典是“纠偏”,是一种文化涵养和文学修养的体现,是对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接纳与吸收。读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创新,而要创新,就要尊重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

二、中西融通

我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与文学,也要从原文读起。中国学术界曾经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从钱锺书到季羨林,举不胜举。纵观这些大师们的生活学习经历,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长大后又去国外学习深造,都被中西文化浸泡过、熏陶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学生和学者,学习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外语,却读不懂外文元典和著作,只能靠一些二三手的译文去卖弄。甚至个别上外国文学课的老师根本不懂英文,仅仅靠翻译来讲授西方文论。他们既不能“博古通今”,也不能“学贯中西”。

我在给研究生编写的教材《中国文学典籍·前言》中说过:“偌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锺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继其学术香火,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再产生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了。”要想解决这一高等教育的尴尬问题,我们只能努力培养大批中外打通高素质的学生。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其中必要的一环,我用英文教材给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课程,采用英国著名理论家尼格拉顿的英文原著作为教材,并使用双语教学。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文著作,同时又克服了学生怕读英文原著的心理障碍,增加了学生阅读英文原著的兴趣。我的一位在高校多年讲授西方文论课程的博士生,在学习《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原著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新批评的细读原来是这样的!”他竟然不知道“细读”是对英文原文“close reading”不准确的翻译,“close reading”是指“封闭式阅读”,即把传统批评理论中的历史因素、传记材料、读者反应等与文本剥离,而只注重文本,重视文本内部的分析。他认为“细读”就是“仔细地阅读”。可见,不读原著,只读翻译的害处有多大。不仅如此,通过对西方原著的阅读,我们还可以更好地、更加精确地理解西方的学术术语和话语背景,以及背景之后的文艺思潮。

为了做到中西融通,我在课程的设置方面,也

做了较大的尝试:中西融通。我把中西文论课放在一起讲授,如果早晨讲授中国古代文论课,下午就讲授西方文论;如果下午上中国古代文论,晚上就上西方文论课,总之,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讲授中西方文论,从东方文化跨越到西方文化,这样,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让学生们体会到中西文化精髓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不但要求教师中西融通,而且,还要求学生尽力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种做法,让我的博士生叫苦不已,但是在我的严格要求和督促下,最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经过一个学期的近乎痛苦的学术训练,他们不但能够在课堂上熟练背诵,而且还能在论文中自如地运用自己背诵的元典知识,基本上能够做到在中西文化中收放自如。

韩晓清:在因材施教上您是怎么做的呢?

曹顺庆: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问题很多,我也尝试着做过一些改革。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教师,对“因材施教”这个词语并不陌生,但在教学中真正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的人却不容易。本来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最有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但是,很多中文系导师却不愿意招收学外语的学生,他们觉得学外语的学生即便是考取了中文的研究生,由于文学功底差,也不会有大的作为,不会写文章,甚至都毕不了业。对此,我却不敢苟同。我一直认为,学习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至少应该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熟悉至少两国以上的文化。所以,我在招收博士研究生时,并不像其他导师那样“害怕”学外语的考生,相反,不管是学习中文的考生,还是学习外语的考生,我都鼓励他们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因此,我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中文专业的,有外语专业的。有些人在本科阶段学的是外语,硕士阶段学的是中文,有些人在本硕阶段都是学外语的,在博士阶段又学习中文。外语专业的同学,有的学的是英语,有的学的是法语,也有的学的是日语,还有学俄语的。

我的研究生都要参加两周一次的研究生论坛,他们在聚会上各抒己见,相互交流,充分展示才能。通过课堂的讨论,再加上平时对他们的观察,结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科特点,我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自身的特点,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对于古文功底好的博士生,我鼓励他们做中国文论的研究,如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李杰的《中国诗学话语》等;对于外语好的博士生,鼓励他们研究中西文学或文化的相互影响,如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蒋承勇的《西方文学“人”的母

题研究——从古希腊到18世纪》;对古文与英文均好的博士生,就鼓励他们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如傅勇林的《诗性智慧的和弦——中外古代文论诗学语言学比较研究》。有的博士生有小语种背景,我就鼓励他们利用优势,如斯明全日语好,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社团流派兴起和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博士陈蜀玉的法语学的非常好,在了解到当时还没有法语全译本的《文心雕龙》后,我就鼓励她把《文心雕龙》全部翻译出来,并且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文心雕龙》法语全译及其研究》的组成部分。她的译本非常成功,填补了《文心雕龙》没有法语全译本的空白。对有跨学科特长的博士生,像彭兆荣、徐新建等对人类学感兴趣,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仪式谱系:文学人类学的一个视野》《民歌与国学》;何云波爱下围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酷爱武术的曾小月,博士学位论文为《武术与中国文学精神》,还有有音乐爱好的、书法嗜好的博士,他们都做了相关方面的论文。总之,我试着做到了各尽其才,因材施教。

韩晓清:按照您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出文学大师来,从您的言辞之间,可以看出您对现今的教育体制不是很满意,并有自己的思考,您能跳出当下的教育体制来培养杰出人才吗?

曹顺庆:培养不出学术大师,我们可以培养和大师们接近的高素养的学者来,尽管这条路充满着艰辛,但是,我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输送学贯中西的学术人才。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用近20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实践,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大部分具备了中西融通的素质,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经作出或正在作着贡献,他们不仅写出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也培养出了许多和自己一样高素养的研究生。现在很多博士已经成了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如傅勇林、蒋承勇、叶舒舒、张荣翼、徐新建、王晓路、罗婷、何云波、曾明、李伟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和我一样,继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着他们应有的贡献,涓涓溪流,长流不息。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跳出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体制,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改革,虽然改革艰难,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够成功,相信我们今后一定能够为国家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来。

“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东南大学新诗谱系的揭橥

□姜耕玉

不同程度上承传汉语诗歌的基因方面做出了努力。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格律理论,已鼎立于新诗史上,研究者甚多,而陆志韦、李思纯的新诗形式主张,似鲜为人知。朱自清称陆志韦是“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由此看来,赵思运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终于表明有学者问津“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而且对于匡正当下新诗弊端,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赵思运提出“东南大学新诗谱系”,陆志韦是这一谱系中第一人。“这一谱系书写了强调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传统,从而迥异于北京大学新诗谱系所奠定的颠覆与反叛传统”。

赵思运对主流新诗中颠覆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倾向的分析,颇为深刻。他认为:“新诗之所以发生在北京大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演性。因为在那个时候,革命与反叛成为一种必须的姿态,而不是新诗建设的必须。在价值立场上,他们普遍崇尚文化进化论,所以特别强调反叛与颠覆。”他还以泰戈尔在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讲学的截然不同的遭遇,发掘其原因是“一为文化至上,一为政治激进。泰戈尔虽然是印度的诗界革命的旗手,但他的革命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的诗歌革命,而是带有改良色彩的文化革命”,泰戈尔在东大体育馆讲演的空前盛况,正相通共融的东方文化气息的诗意奇迹。陆志韦与东南大学新诗谱系,对胡适创立的新诗,采取了温和的“补天”态度,思考与探索如何使在一张白纸上诞生的新诗自我健全完善起来?

作为个案研究的专著《诗人陆志韦研究及其诗作考证》,既致力于诗学分析,又吸取了胡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在翔实的材料取证与整合中,凝练观点,显示其切实的理论分量。赵思运在对胡适避其所短,扬其所长,值得称道。胡适毕竟是多有建树的天才。陆志韦1915年留学美国,专攻心理学,1920年回国后转向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学家。他在早期白话诗创作实践中,对新诗形式就开始思考与探索。他在《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中,提出了新诗语言形式建设的核心理论——节奏问题。“我并不反对把口语的天籁作为诗的基础,然而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是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工夫。”他主张在诗的节奏上,“舍平仄而采抑扬”,“节奏千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是罪恶”,并提出押活韵的规则。陆志韦的新诗“节奏”论,深入揭示了汉语诗美的特质,具有新诗形式建设的重要理论价值。

赵思运是颇有思想与才华的诗家,常有弄潮儿的姿势。他能够潜心于早期白话诗家陆志韦研究,并对陆志韦零散发表的诗作以及散佚民间的诗集,进行了细致的追索、考证与编辑,彰显了中国新诗史上一个理论上的被遮蔽者、一个诗人身中的失踪者,堪称抒写新诗史的有功之臣。

美国导演制作团队加盟华鼎奖

本报讯 7月12日,美国导演唐·米歇尔及其制作团队(DMP)正式加盟天下英才传媒集团主办的华鼎奖,双方宣布将于今明两年分别在中国澳门和美国好莱坞各举办一届华鼎奖颁奖典礼。此次艺术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亦标志着华鼎奖将首次走出国门,正式启动其国际化进程。据悉,华鼎奖未来10年将陆续在世界多国举办颁奖典礼。

华鼎奖创办于2007年,是基于对演艺名人公众形象、电影、电视剧等进行的满意度调查而评选出的奖项,由于获奖结果完全由中国观众自主投票产生,也被誉为“观众口碑奖”。唐·米歇尔是美国知名的电

视节目及大型活动实况转播导演和制作人,其团队曾制作过奥斯卡颁奖晚会、奥运会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并与不少当红明星有过合作,被称为“美国世界级电视节目精英制作团队”。

谈及此次受邀加盟华鼎奖,米歇尔表示,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越来越发达,这样的合作搭建了一个中美文化交流的有益平台。华鼎奖注重观众的感受,这种特别的评奖方式令人很感兴趣,自己也会竭尽所能将国际流行元素引入该奖项。希望双方联袂打造的华鼎奖能以崭新的形式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和冲击。

(王 兔)

专家研讨报告文学《我欲因之梦寥廓》

本报讯 7月13日,谷代双长篇报告文学《我欲因之梦寥廓——高淳“螃蟹文化”现象》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江苏省作协主办,《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承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和近20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我欲因之梦寥廓》以“螃蟹文化”为切入点,艺术地表现了以江苏高淳人为代表的江南水乡人民攻坚克难、追求梦想、不断开拓幸福生活新境界的时代风貌。作者谷代双是长期生活于高淳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多年来始终关注着不断壮大的高淳螃蟹产业,并一直潜心积累素

材。作家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没有就事论事地叙述螃蟹经济的发展过程,而是站在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以现代观念挖掘螃蟹经济推动当地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

与会者认为,《我欲因之梦寥廓》脉动着“中国梦”的时代精神主旋律,犹如一首中国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二重奏的进行曲。作者着力描述的“固城湖螃蟹”及其辐射的美食、养殖、营销、节庆等多方面内容,赋予螃蟹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当地人民坚忍顽强、团结进取,科学发展的精神象征。作品具有较强的真实性、文学性和知识性,语言考究,剪裁得当,人物塑造鲜活生动。

(范 得)

25名作家与湖北省文学院签约

本报讯 湖北省作协日前在武汉召开第九届签约作家总结暨第十届签约作家签约仪式,25名作家与湖北省文学院签约。

湖北省作协文学院院长陈应松作了第九届签约作家工作总结。他说,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这两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专业作家方方、刘继明、田禾等新作连连,多篇得奖。第九届签约作家共27人,他们努力创作,辛勤耕耘,共完成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106部,诗歌、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数百篇(首),总计作品

318部,原创作达1164万字。曹军庆、普玄、王芸、王君、哨兵、李遇春等逐渐被文坛所熟悉,有大量作品被《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刊发,一批作品获各类奖项。

会上,第十届25名作家与湖北省作协签约。此次的签约作家体现了两方面的倾斜,一是向诗人倾斜,二是向网络作家倾斜,这也是湖北省文学院应对文学形势的现实变化而采取的新举措。

(欣 阅)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英、美、法及国内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研讨会缘起于赵敏俐与吴思康主编的《中国诗歌通史》(11卷本)和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汉译本)的出版。与会专家学者分析了两部著作切入中国文学的不同视角,叙述模式和写作目的,探讨了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

书写中国文学史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多种可能,分析了中国文学的历史逻辑和文学精神、中华文学的多元结构和丰富内涵。文学史作者还交流了写作经验,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的关系等。本次研讨会是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次有益交流,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史观之间的交融与理解,它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富 丽)